

中国城市营建史研究书系 吴庆洲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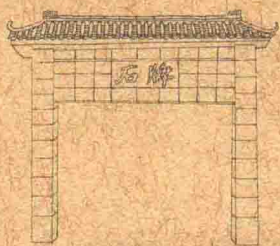
乡城

类型—形态学视野下的广州石牌空间史
(1978—2008)

Metropolis of Rurality

A Spatial History of Shipai in Guangzhou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ypo-morphology (1978-2008)

◎ 黄金乐 著



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古代城市规划、设计的哲理、学说及历史经验研究」(项目号 5067807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古城水系营建的学说及历史经验研究」(项目号 51278197)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明清广州府宗族村落空间形态格局研究」(项目号 14YJAZH019)

中国城市营建史研究书系 吴庆洲 主编

乡城

类型——形态学视野下的广州石牌空间史(1978—2008)

Metropolis of Rurality

A Spatial History of Shipai in Guangzhou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ypo-morphology (1978-2008)



黄全乐 著

Huang Quanl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城 类型: 形态学视野下的广州石牌空间史: 1978~2008 / 黄全乐著.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5.2
(中国城市营建史研究书系)
ISBN 978-7-112-17818-6

I. ①乡… II. ①黄… III. ①城镇—城市建设—城市史—广州市—
1978~2008 IV. ①TU984.2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35091号

责任编辑: 袁瑞云

中国城市营建史研究书系
乡城 类型—形态学视野下的广州石牌空间史(1978—2008)

黄全乐 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广州友间文化有限公司制版
广州佳达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 15 $\frac{3}{8}$ 字数: 291千字
2015年2月第一版 2015年2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40.00元

ISBN 978-7-112-17818-6

(27064)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中国城市营建史研究书系编辑委员会名录

顾 问（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瑞珠 阮仪三 邹德慈 夏铸九 傅熹年

主 编：

吴庆洲

副主编：

苏 畅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其亨 王贵祥 田银生 刘克成 刘临安
陈 薇 赵万民 赵 辰 常 青 程建军
傅朝卿

Paolo Ceccarelli（齐珂理，意大利）

Peter Bosselmann（鲍斯文，德国）

总序 迎接中国城市营建史研究之春天

吴庆洲

本文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的“中国城市营建史研究书系”的总序。笔者希望借此机会，讨论中国城市营建史研究的学科特点、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特色等若干问题，以推动中国城市营建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一、关于“营建”

“营建”是经营、建造之谓，包含了从筹划、经始到兴造、缮修、管理的完整过程，正是建筑史学中关于城市历史研究的经典范畴，故本书系以“城市营建史”称之。在古代汉语文献中，国家、城市、建筑的构建都常使用营建一词，其所指不仅是建造，也同时有形而上的意涵。

中国城市营建史研究的主要学科基础是建筑学、城市规划学、考古学和历史学，以往建筑史学中有“城市建设史”、“城市发展史”、“城市规划史”等称谓，各有关注的角度和不同的侧重。城市营建史是城市史学研究体系的子系统，不能离开城市史学的整体视野。

二、国际城市史研究及中国城市史研究概况

城市史学的形成期十分漫长。在城市史被学科化之前，已经有许多关于城市历史的研究了，无论是从历史的视角还是社会、政治、文学等其他视角，这些研究往往与城市的集中兴起、快速发展或危机有关。

古希腊的城邦和中世纪晚期意大利的城市复兴分别造就了那个时代关于城市的学术讨论，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学则源自工业革命之后的城市发展高潮。一般认为，西方的城市史学最早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芝加哥等地，与城市社会学渊源颇深。^[1]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地区的社会史、城市史、地方史等有了进一步发展。但城市史学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在20世纪60年代才出现的。著名的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 1895—1990）著《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即成书于1961年。现在，芒福德、本奈沃洛

[1] 罗澍伟. 中国城市史研究述要[J]. 城市史研究, 1988, 1.

（Leonardo Benevolo, 1923—）、科斯托夫（Spiro Kostof, 1936—1991）等城市史家的著作均已有中文译本。据统计，国外有关城市史著作20世纪60年代按每年度平均计算突破了500种，70年代中期为1000种，1982年已达到1400种。^[1]此外，海外关于中国城市的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 1923—2008）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罗威廉（William Rowe, 1931—）的汉口城市史研究、申茨（Alfred Schinz, 1919—）的中国古代城镇规划研究、赵冈（1929—）经济制度史视角下的城市发展史研究、夏南悉（Nancy Shatzman-Steinhardt）的中国古代都城研究以及朱剑飞、王笛和其他学者关于北京、上海、广州、佛山、成都、扬州等地的城市史研究已经逐渐为国内学界熟悉。仅据史明正著《西文中国城市史论著要目》统计，至2000年11月，以外文撰写的中国城市史有论著200多部（篇）。

中国古代建造了许多伟大的城市，在很长的时间里，辉煌的中国城市是外国人难以想象也十分向往的“光明之城”。中国古代有诸多关于城市历史的著述，形成了相应的城市理论体系。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刘敦桢先生的《汉长安城与未央宫》发表于1932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卷3期，开国内城市史研究之先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热潮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应该说，这与中国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不无关系。许多著作纷纷问世，至今已有数百种，初步建立了具有自身学术特色的中国城市史研究体系。这些研究建立在不同的学术基础上，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人类学、水利学和建筑学等一级学科领域内，相当多的学者关注城市史的研究。城市史论著较为集中地来自历史地理、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建筑史、考古学、水利史、人类学等学科，代表性的作者如侯仁之（1911—）、史念海（1912—2001）、杨宽（1914—2005）、韩大成（1924—）、隗瀛涛（1930—2007）、皮明庥（1931—）、郭湖生（1931—2008）、马先醒（1936—）、傅崇兰（1940—）等先生。因著作数量较多，恕不一一列举。

由20世纪80年代起，到2010年，研究中国城市史的中外著作，加上各大学城市史博士学位论文，估计总量应达500部以上。一个研究中国城市史的热潮正在形成。

近年来城市史学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对空间的日益重视——无论是形态空间还是社会空间，而空间研究正是城市营建史的传统领域，营建史学者们在空间上的长期探索已经在方法上形成了深厚的积淀。

[1] 近代重庆史课题组. 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意义、内容及线索. 载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城市科学研究会主办. 城市史研究. 第5辑.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1.

三、中国城市营建史研究的回顾

城市营建史研究在方法和内容上不能脱离一般城市史学的基本框架，但更加偏重形式制度、城市规划与设计体系、形态原理与历史变迁、建造过程、工程技术、建设管理等方面。以往的中国城市营建史研究主要由建筑学者、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来完成，亦有较多来自社会学者、人类学者、经济史学者、地理学者和艺术史学者等的贡献，学科之间融合的趋势日渐明显。

虽然刘敦桢先生早在1932年发表了《汉长安城与未央宫》，但相对于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而言，中国城市营建史的起步较晚。同济大学董鉴泓教授主编的《中国城市建设史》1961年完成初稿，后来补充修改成二稿、三稿，阮仪三参加了大部分资料收集及插图绘制工作，1982年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是系统讨论中国城市营建史的填补空白之作，也是城市规划专业的教科书。我本人教过城市建设史，用的就是董先生主编的书。后来该书又不断修订、增补，内容更加丰富、完善。

郭湖生先生在城市史研究上建树颇丰，在《建筑师》上发表了中华古代都城小史系列论文，1997年结集为《中华古都——中国古代城市史论文集》（台北：空间出版社）。曹汛先生评价：

“郭先生从八十年代开始勤于城市史研究，自己最注重地方城市制度、宫城与皇城、古代城市的工程技术等三个方面。发表的重要论文有《子城制度》、《台城考》、《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宫室制度沿革——兼论日本平城京的宫室制度》等三篇，都发表在日本的重头书刊上。”^[1]

贺业钜先生于1986年发表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论丛》，1996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是另一本重要著作，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制度进行了较深入细致的研究。

吴良镛先生一直关注中国城市史的研究，英文专著《中国古代城市史纲》1985年在联邦德国塞尔大学出版社出版，他还关注近代南通城市史的研究。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科对城市史的研究始于龙庆忠（非了）先生，龙先生1983年发表的《古番禺城的发展史》是广州城市历史研究的经典文献。

其实，建筑与城市规划学者关注和研究城市史的人越来越多，以上只是提到几位老一辈的著名学者。至于中青年学者，由于人数较多，难以一一列举。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博士点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培养城市史和城市防灾研究的博士生，龙先生培养的五个博士中，有四位的博

[1] 曹汛. 伤悼郭湖生先生[J]. 建筑师2008, 6: 104-107.

士论文为城市史研究：吴庆洲《中国古代城市防洪研究》（1987），沈亚虹《潮州古城规划设计研究》（1987），郑力鹏《福州城市发展史研究》（1991），张春阳的《肇庆古城研究》（1992）。龙先生倡导在城市史研究中重视城市防灾（其实质是重视城市营建与自然地理、百姓安危的关系）、重视工程技术和管理技术在城市营建过程中的作用、重视从古代的城市营建中获取能为今日所用的经验与启迪。

龙老开创的重防灾、重技术、重古为今用的特色，为其学生们所继承和发扬。陆元鼎教授、刘管平教授、邓其生教授、肖大威教授、程建军教授和笔者所指导的博士中，不乏研究城市史者，至2010年9月，完成的有关城市营建史的博士学位论文已有20多篇。

四、中国城市营建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诚如许多学者所注意到的，近年以来，有关中国城市营建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既有基于传统研究方法的整理和积累，也从其他学科和海外引入了一些新的理论、方法，一些新的技术也被引入到城市史研究中。笔者完全同意何一民先生的看法：城市史研究已经逐渐成为与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学科密切联系而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门新学科。^[1]

笔者认为，中国城市营建史的研究虽然面临着方法的极大丰富，但仍应注意立足于稳固的研究基础。关于方法，笔者有如下的体会：

1. 系统学方法

系统学的研究对象是各类系统。“系统”一词来自古代希腊语“systemα”，是指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现代系统思想作为一种对事物整体及整体中各部分进行全面考察的思想，是由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1901—1972）提出的。系统论的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观念。

钱学森在1990年提出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Open Complex Giant System）理论中，根据组成系统的元素和元素种类的多少以及它们之间关联的复杂程度，将系统分为简单系统和巨系统两大类。还原论等传统研究方法无法处理复杂的系统关系，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meta-synthesis）才是处理开放、复杂巨系统的唯一正确的方法。这个研究方法具有以下特点：（1）把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有机结合起来；（2）把科学技术方法和经验知识结合起来；（3）把多种学科结合起来进行交叉研究；（4）把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结合起来。^[2]

[1] 何一民主编. 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M]. 成都：巴蜀书社，2007：14.

[2] 钱学森，于景元，戴汝. 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J]. 自然杂志，1990，1：3-10.

城市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不是细节的堆积。

2. 多学科交叉的方法

中国城市营建史不只是城市规划史、形态史、建筑史，其研究涉及建筑学、城市规划学、水利学、地理学、水文学、天文学、宗教学、神话学、军事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灾害学等多种学科，只有多学科的交叉，多角度的考察，才可能取得好的成果，靠近真实的城市历史。

3. 田野与文献不能偏废，应采用实地调查与查阅历史文献相结合、考古发掘成果与历史文献的记载进行印证相结合、广泛的调查考察与深入细致的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4. 比较研究

和许多领域的研究一样，比较研究在城市史中是有效的方法。诸如中西城市、沿海与内地城市、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城市的比较研究，往往能发现问题，显现特色。

5. 借鉴西方理论和方法应考虑是否适用中国国情

中国城市营建史的研究可以借鉴西方一些理论和方法，诸如形态学、类型学、人类学、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等。但不宜生搬硬套，应考虑其是否适用于中国国情。任放先生所言极有见地：

任何西方理论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适用度，都必须通过实证研究加以证实或证伪，都必须置于中国本土的历史情境中予以审视，绝不能假定其代表客观真理，盲目信从，拿来就用，造成所谓以论带史的削足适履式的难堪，无形中使中国历史的实态成为西方理论的注脚。我们应通过扎实的历史研究，对西方理论的某些概念和分析工具提出修正或予以抛弃，力求创建符合中国社会情境的理论架构。

在借鉴西方诸社会科学方法时，应该保持警觉，力戒西方中心主义的魅影对研究工作造成干扰。^[1]

6. 提倡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创新

依靠多学科交叉、借鉴其他学科，就有可能找到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

比如，拙著《中国古城防洪研究》第四章第三节“古代长江流域城市水灾频繁化和严重化”中，研究表明，中国历代人口的变化与长江流域城市水灾的频率的变化有着惊人的相关性，从而得出“古代中国人口的剧增，加重了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加重了城市水灾”的结论。^[2]这是从社会学的角度以人口变化的背景研究城市水灾变化的一种探索，仅仅从工程技术的角度是很难解答这一问题的。

[1] 任放. 中国市镇的历史研究与方法[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57-358，367.

[2] 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187-195.

五、中国城市营建史的研究要突出中国特色

类似生物有遗传基因那样，民族的传统文化（包括科学），也有控制其发育生长，决定其性状特征的“基因”，可称“文化基因”。文化基因表现为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和心理底层结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有明显的阴性偏向，其本质性特征与一般女性的心理和思维特征相一致；而西方则有明显的阳性偏向，其特征与一般男性的心理和思维特征相一致。

在古代学术思想史上，西方学者多立足空间以视时间；中国学者多立足时间以视空间。所以西方较多地研究了整体的空间特性和空间性的整体，中国则较多地探寻了整体的时间特性和时间性的整体。^[1]

世界上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有极强的渗透性、继承性、守常性。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思维方式的考察对于说明世界历史的发展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社会、哲学、宗教、艺术、道德、语言文字等方面，中国与欧洲鲜明显示出两种不同的体系，不同的走向，不同的格调。^[2]

由于“文化基因”的不同，中国城市的营建必然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的城市是中国人在自己的哲学理念指导下，根据城市的地理环境选址，按照自己的理想和要求营建的，中国的城市体现的是中国的文化特色。中国城市营建史一定要注意中国特色、研究中国特色、突出中国特色。

我们运用现代系统论的理论，也要认识到中国古代的易经和老子哲学也是用的系统论观点，认为天、地、人三才为一个开放的宇宙大系统，天、地、人、三才合一为古人追求的最高的理想境界，这些都投射到了城市营建之中。

赵冈先生从经济史的角度出发，发现中国与西方的城市发展完全不同。第一，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政治力量，不待工商业之兴起，所以中国城市兴起很早。第二，政治因素远不如工商业之稳定，常常有巨大的波动及变化，所以许多城市的兴衰变化也很大，繁华的大都市转眼化为废墟是屡见不鲜之事。此外，赵冈的研究还发现中国的城乡并不似欧洲中世纪那样对立，战国以后井田制度解体，城乡人民可以对流，基本上城乡是打成一片的。^[3] 赵冈先生的研究成果显现了中国城市的若干特色。

中国城市营建史中有着太多的特色等待着更多的研究者去做深入的发掘。即以笔者的研究体会为例：

[1] 田盛颐. 中国系统思维再版序. 刘长林著. 中国系统思维——文化基因探视[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2] 刘长林. 中国系统思维——文化基因探视[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2.

[3] 赵冈. 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M].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90-91.

中国的古城的城市水系，是多功能的统一体，被称为古城的血脉。^[1]这是一大特色。

作为军事防御用的中国古代城池，同时又能防御洪水侵袭，它是军事防御和防洪工程的统一体，^[2]为其一大特色。

研究城市形态，可别忘了，我国古人按照周易哲学，有“观象制器”的传统，也有“仿生象物”的营造意匠。^[3]

只有关注中国特色，才能发现并突出中国特色，才能研究出真正的中国城市营建史的成果。

六、研究中国城市营建史的现实意义

中国古城有6000年以上的历史，在古代世界，中国的城市规划、设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建设了当时最壮美、繁荣的城市。汉唐的长安城、洛阳城，六朝古都南京城、宋代东京城、南宋临江城、元大都城、明清北京城都是当时最壮丽的都市。明南京城是世界古代最大的设防城市。中国古代城市无论在规模之宏大、功能之完善、生态之良好、景观之秀丽上，都堪称当时世界之最。

吴良镛院士指出：

中国古代城市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封建社会时期，中国城市文化灿烂辉煌，中国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城市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其特点是：城市分布普遍而广泛，遍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城市体系严密规整，国都、州、府、县治体系严明；大城市繁荣，唐长安、宋开封、南宋临安等地区可能都拥有百万人口；城市规划制度完整，反映了不得逾越的封建等级制度等等；所有这些都世界城市史上占有独特的重要地位。……中国古代城市有高水平的建筑文化环境。中国传统的城市建设独树一帜，‘辨方正位’，‘体国经野’，有一套独具中国特色的规划结构、城市设计体系和建筑群布局方式，在世界城市史上也占有独特的位置。^[4]

中国古人在城市规划、城市设计上有相应的哲理、学说以及丰富的历史经验，这是一笔丰厚的文化与科学技术遗产，值得我们去挖掘、总结，并将其有生命活力的部分，应用于今天的城市规划、城市设计之中。

20世纪80年代之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迅速加快，但城市规划的理论和实践处于较低水平，并且理论尤为滞后。正因为城市规划理论的滞后，

[1] 吴庆洲. 中国古代的城市水系[J]. 华中建筑, 1991, 2: 55-61.

[2] 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563-572.

[3] 吴庆洲. 仿生象物——传统中国营造意匠探微[J]. 城市与设计学报, 2007. 9, 28: 155-203.

[4] 吴良镛. 建筑·城市·人居环境[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378-379.

我们国家的城市面貌出现城市无特色的“千城一面”的状况。出现这种状况有两种原因：

一是由于我们的规划师、建筑师不了解我国城市的过去，也没有结合国情来运用西方的规划理论，而是盲目效仿。正如刘太格先生所认为的：“欧洲城市建设善于利用山、水和古迹，其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创作都具有本土特色，在长期的城市发展中，设计者们较好地实现了新旧文明的衔接，并进而向全球推广欧洲文化。亚洲城市建设过程中缺少对山水和古迹的保护，设计者中‘现代化’、‘国际化’的追随者较多，设计缺少本土特色。”即亚洲的“建设者自信不足，不了解却迷信西方文化，盲目地崇拜和模仿西洋建筑，而不珍惜亚洲自己的文化。”^[1]事实上，山、水在中国古代城市的营建中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例如广州城，便立意于“云山珠水”。只是由于当代人对城市历史的不了解，山水才在城市的蔓延和拔高中逐渐变得微不足道，以至于成为了被慢慢淡忘的“历史”了。

二是中国古城营建的哲理、学说和历史经验，尚有待总结，才能给城市规划师、建筑师和有关决策者、建设者和管理人员参考运用。城市营建的历史本身是一种记忆，也是一门重要而深奥的学问。中国城市营建史研究不可建立在功利性的基础之上，但城市营建的现实性决定了它也不能只发生在书斋和象牙塔之内，对于处于巨变中的中国城市来说，城市营建在观念、理论、技术和管理上的历史经验、智慧和教训完全应该也能够成为当代城市福祉的一部分。

中国城市营建史之研究，有重大的理论研究价值和指导城市规划、城市设计的实践意义。从创造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城市，以及对世界城市规划理论作出中国应有的贡献这两方面，这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都是重大的。

七、中国城市营建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各个学科研究城市史各有其关注的重点。笔者认为，以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学以及历史学为基础学科的中国城市营建史的研究应体现出自身学科的特色，应在城市营建的理论、学说，城市的形态、营建的科学技术以及管理等方面作更深入、细致的研究。中国城市营建史应关注：

- (1) 中国古代城市营建的学说；
- (2) 影响中国古代城市营建的主要思想体系；
- (3) 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的学说和实践；
- (4) 城市的营造意匠与城市的形态格局；

[1] 万育玲. 亚洲城乡应与欧洲争艳——刘太格先生谈亚洲的城市建设[J]. 规划师. 2006, 3: 82-83.

- (5) 中国古代城池军事防御体系的营建和维护；
- (6) 中国古城防洪体系的营造和管理；
- (7) 中国古代城市水系的营建、功用及管理维护；
- (8) 中国古城水陆交通系统的营建与管理；
- (9) 中国古城的商业市街分布与发展演变；
- (10) 中国古代城市的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
- (11) 中国古代城市的园林和生态环境；
- (12) 中国古代城市的灾害与城市的盛衰；
- (13) 中国古代的战争与城市的盛衰；
- (14) 城市地理环境的演变与其盛衰的关系；
- (15) 中国古代对城市营建有创建和贡献的历史人物；
- (16) 各地城市的不同特色；
- (17) 城市营建的驱动力；
- (18) 城市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特点与规律；
- (19) 中外城市营建思想比较研究；
- (20) 中外城市营建史比较研究，等等。

八、迎接中国城市营建史研究之春天

中国城市营建史研究书系首批出版十本，都是在各位作者所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补充而成的，也是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学术研究成果。这十本书分别是：

- (1) 苏畅著《〈管子〉城市思想研究》；
- (2) 张蓉著《先秦至五代成都古城形态变迁研究》；
- (3) 万谦著《江陵城池与荆州城市御灾防卫体系研究》；
- (4) 李炎著《南阳古城演变与清“梅花城”研究》；
- (5) 王茂生著《从盛京到沈阳——城市发展与空间形态研究》；
- (6) 刘凯著《晚清汉口城市发展与空间形态研究》；
- (7) 傅娟著《近代岳阳城市转型和空间转型研究（1899—1949）》；
- (8) 贺为才著《徽州村镇水系与营建技艺研究》；
- (9) 刘晖著《珠江三角洲城市边缘传统聚落的城市化》；
- (10) 冯江著《祖先之翼——明清广州府的开垦、聚族而居与宗族祠堂的衍变》。

这些著作研究的时间跨度从先秦至当下，以明清以来为主。研究的地域北至沈阳，南至广州，西至成都，东至山东，以长江以南为主。既有关于城市营建思想的理论探讨，也有对城市案例和村镇聚落的研究，以案例的深入分析为主。从研究特点的角度，可以看到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

主题：城市营建理论、社会变迁与城市形态演变、城市化的社会与空间过程、城与乡。

《〈管子〉城市思想研究》是一部关于城市思想的理论著作，讨论的是我国古代的三代城市思想体系之一的管子营城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有六位作者的著作是关于具体城市的案例解析，因为过往的城市营建史研究较多地集中于都城、边城和其他名城，相对于中国古代城市在层次、类型、时期和地域上的丰富性而言，营建史研究的多样性尚嫌不足，因此案例研究近年来在博士论文的选题中得到了鼓励。案例积累的过程是逐渐探索和完善城市营建史研究方法和工具的过程，仍然需要继续。

另有三位作者的论文是关于村镇甚至乡土聚落的，可能会有人认为不应属于城市史研究的范畴。在笔者看来，中国古代的城与乡在人的流动、营建理念和技术上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区域史框架之内的聚落史是城市史研究的另一方面。

正是因为这些著作来源于博士学位论文，因此本书系并未有意去构建一个完整的框架，而是期待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能够陆续出版，期待更多的青年学人投身于中国城市营建史的研究之中。

让我们共同努力，迎接中国城市营建史研究之春天的到来！

吴庆洲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教授

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学术委员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主任

序

《乡城 类型—形态学视野下的广州石牌空间史（1978—2008）》是我的学生黄全乐在她于法国巴黎通过答辩的法语版博士论文基础上，翻译修改而成的。

黄全乐在我的指导下攻读硕士学位时，已经表现出了对城市空间与社会文化的关注，并以广州市的旧城更新课题作为她的研究方向。后来她于2001~2010年间留学法国，追随了自己内心对城市空间的浓厚兴趣，选择法国建筑学院里在城市研究领域最权威的巴黎美丽城国立高等建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一扎就是十年。这期间，由于选题的特殊性以及工作的关系，她除了在巴黎的研习修炼，就是数次返回国内进行田野调查。我亦在她回国的期间，尽力给予相关的支持和指导。这本书，是以欧洲的城市研究理论为基础，以国内特殊城市课题为对象的一份极有特色的研究成果。

该研究从一名建筑师特有的空间敏感性出发，以形态学的视角来观察社会变迁，并致力于用建筑学和城市规划的专业工具，来分析被广泛忽略的中国高速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有的城市形态，考查它是如何在一系列复杂的背景下具体成形的。继而在此研究的基础上，探索理解中国的城市空间与社会变迁之间互动关系的有效路径。

中国现状的城市化进程，几乎是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城市演进历程在几十年间浓缩而成的缩影。它的速度令人惊叹，然而它曾面对的、和所带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引人关注。城中村现象，是中国大都市发展进程中普遍面临的问题，它确实给城市化发展带来空间的和社会的挑战，值得学术界与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和解读。然而国内的研究多数集中在密密匝匝的城中村聚落本身的转型，对于曾经属于城中村集体、而后在城市化过程中被征去的那些土地上发生的变迁，很少被和前者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

本研究认为城市化进程中最关键的是土地问题：它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和当代制度中极度复杂性。土地在传统中国有着多层意义，这个研究力图探索从文化、经济、政治等不同角度的土地意义，它们又是如何影响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新时期的城乡博弈的机制。无论是在传统乡间还是地方政府，土地都具有文化、经济以及利益权力调解的作用：对于乡间而言，土地的文化意义从耕地、墓地、居住地等角度，都有着息息相关的意义；对于后者也就是政府而言，土地政策来自政府的决策，也是城市发展的空间载体。

对于城中村的研究，比较多的是从社会学角度去讨论成因。而城市规划学科则多是从自上而下的单向角度出发，希望从城市管理和宏观政策的层面，来探讨如何把城中村融合或者消解到“主流”的城市空间之中。实际上，在快速城市发展的珠三角地区，城市化的进程依赖于对于过去乡村土地的蚕食和改变，这是一个被广为忽视的反向影响力——乡村社会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和渗透。也就是说，存在这一个另外的角度：乡村是如何影响和参与城市化的过程。

岭南建筑和村庄聚落有着很强的地域特性，其表现的层面有许多。早期南下开发岭南的移民聚落，在陌生的新环境中通过家族力量抱团取暖，来共同面对自然和社会的各种挑战，并形成了基于地缘和血缘关系的空间载体和文化力量：通过高度聚居的地缘关系之维系，来强化基于血缘的家族关系；反过来，血缘关系的密切，又强化了聚居空间的特点。本书揭示了这种聚落的文化传统如何固化在村落的物质空间载体上，并借后者得以维系和延续，历经数个世纪，直至当代城市化冲击的到来。借助这种集体的而非个体的自组织力量的适应和博弈，乡村聚落及其成员才得以实现平稳过渡、直至融入现代化大都市。

乡村社会宗族自治的传统，在中国南方的历史源远流长，这种文化传统下的物质与非物质生活对广州城市生长历史悠久的深刻影响，被作者以真实具体的案例解析所印证。这种自下而上的籍由民间自组织的适应城市化的力量，与官方主导的城市化相互作用，构成了城市发展的事实机制。

对于城中村原本作为富有岭南特色的乡村聚落的传统空间与文化基因，在广州这个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的实验性大都市里的角色和影响，在城市规划学科乃至社会学科，均甚少被关注。然而只有真正洞悉并善于引导这种机制，才有广州城市科学发展的未来。

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高速城市化进程之研究，本是一个庞大的课题，本书通过一个具体的城市个案——广州石牌地区——如何面对和参与这个进程的空间解析，城中村形成存在着某种机制，它是如何真正的中国式的“城市化”结合起来？从微观的建筑细节尺度、中观的街区尺度到宏观的城市尺度，它们之间如何相互作用，透过表面的形和像，研究在时间和空间不同维度的城村互动。建筑存在着不同的类型，城市在此基础上生长不同的形态，这个研究在建筑类型学和城市形态学的结合的基础上，解决了其他学科未曾呈现的角度：建筑和空间的物质实体对于维系社会空间的重要性。

本研究的可贵尝试，在于通过以空间形态分析的本学科专业手段与城市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结合的视野，来理解社会与空间演变机制的互为因果、相互作用的关系。这是一个至今为止，针对城中村与城市化研究这一课题的、比较少见但非常有效的研究路径：以空间形态变迁的图

像分析的语言，来讲述一场跌宕起伏和色彩纷呈的城市转型与社会变迁故事，以及背后隐藏的空间密码和逻辑。

作者在近六年的前期调研阶段，利用作为建筑师参与城市建设项目之便，不仅获得了大量珍贵的一手素材，而且进行了多次深入的现场调研，对于涉及城市发展和城中村变化的群体和个人的访谈，更使其研究具有了原创性和实证的力量。得益于扎实的田野调查和基础资料，本书论证阐释的成果能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式的城市化，理解广州——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和试验城市——其城市化进程自1978年以来所面对的各种考验的特殊复杂性。

城乡空间转型历程在继续，如何将不同的空间形态与社会结构积极地整合结合到城市的发展格局中，如何做到真正开放的接纳和吸收甚至兼容？在这个问题上，本书不仅暗示了城市发展的应有逻辑，而且提出了关于空间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立场。相信本书对于城乡关系如何从转型期过渡到新型城镇化，如何合理地兼顾人和空间的双重、同步城镇化，有智慧地弥补和优化城市规划和发展的策略，均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黄全乐的研究成果能够藉由《中国城市营建史研究书系》的机会，经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得以出版，我感到十分高兴和欣慰。希望这份历时多年、跨越学术国界的研究成果，能不负这套书系的盛名。

何镜堂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院长

2014年12月于广州